

# 古尔纳《天堂》中的旅行叙事与流散诗学建构

聂卢梦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2日

## 摘要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天堂》借用并重构了经典探险文学模式, 将旅行叙事转化为审视东非殖民历史与流散生存境遇的批评透镜。不同于传统帝国文本中的征服者视角, 小说确立了第三人称有限的儿童视角, 通过主人公优素福“被动”与“沉默”的在场, 揭示了流散个体在多重权力压迫下主体性的丧失与异化。小说构建了多语言并置的“接触地带”, 利用混杂的复调话语打破了单一语言霸权; 同时, 通过非线性的弥赛亚时间与多重嵌套的叙事结构, 在形式上外化了流散身份碎片化、动态性与未完成的特质。这种叙事策略使得旅行不再是单纯的空间位移, 而是演变成为一种“去家园化”的文化心理隐喻。优素福最终未能抵达“天堂”的开放式结局, 不仅完成了对《黑暗之心》等经典文本中种族中心主义的有力反写, 更确立了一种独特的流散诗学: 归属不在于抵达终点, 而在于在文化夹缝与历史断裂中进行的永恒且艰难的身份重构。

## 关键词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旅行叙事, 流散诗学, 后殖民

## Travel Narr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asporic Poetics in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Lumeng Ni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ch 4, 2026; accepted: April 10, 2026; published: April 22, 2026

## Abstract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appropriates and reconstructs the classic model of adventure liter-

ature, transforming the travel narrative into a critical lens for examining East African colonial history and the diasporic condition. Distinct from the conqueror's perspective found in traditional imperial texts, the novel establishes a limited third-person child focalization. Through the protagonist Yusuf's "passive" and "silent" presence, the narrative reveals the loss and alienation of diasporic subjectivity under multiple layers of oppressive power. The novel constructs a "contact zone" characterized by the juxtaposition of multiple languages, utilizing hybrid polyphonic discourse to shatter monolingual hegemony. Meanwhile, through non-linear Messianic time and a multi-layered nested narrative structure, it formally externalizes the fragmented, dynamic, and unfinished nature of diasporic identity. This narrative strategy transforms travel from a mere spatial displacement into a cultural-psychological metaphor for "unhoming". The open-ended conclusion, in which Yusuf fails to reach "Paradise", not only serves as a powerful "writing back" against the ethnocentrism of classic texts like *Heart of Darkness*, but also establishes a unique diasporic poetics: belonging lies not in reaching a final destination, but in the eternal and arduous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within cultural interstices and historical ruptures.

## Keywords

Abdulrazak Gurnah, Travel Narrative, Diasporic Poetics, Postcolonia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天堂》(Paradise)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坦桑尼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的代表作,曾入围1994年布克奖决选名单。作为流散异邦的移民作家,古尔纳擅长以一种“双重焦距”审视非洲本土社会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纠葛,其写作被誉为以毫不妥协和充满同情心的眼光洞察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身处不同文化与大陆的鸿沟间的难民命运。小说讲述了被父亲抵债给阿拉伯商人阿齐兹(Aziz)的少年优素福(Yusuf),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东非大陆经历的多次迁徙与成长。这一文本不仅赋予了边缘化的非洲主体以凝视权,更通过主人公在内陆与滨海之间的流转,绘制了一幅交织着贸易、宗教与权力争夺的东非图景。

在现有的学术视野中,针对《天堂》的研究多聚焦于历史记忆、身份政治与创伤伦理等维度,深刻反思了非洲历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国外学者倾向于将文本置于互文性与后殖民史学框架下展开探讨:Mustafa (2015)将《天堂》置于涵盖《黑暗之心》与斯瓦希里旅行故事的互文网络中,揭示了古尔纳如何通过批判殖民与前殖民体系,恢复当地历史中被遮蔽的边缘声音[1];Noguer (2023)聚焦于流离失所的创伤体验,强调主人公优素福的奴役经历映射了印度洋地区被连根拔起的集体历史,并指出对《古兰经》中约瑟故事的引用赋予了这一主题普遍性[2];Göttsche (2023)则从地缘政治角度指出,小说描绘了德国殖民统治对阿拉伯-斯瓦希里贸易体系的冲击,展现了“竞争性现代性”下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剥削现象[3]。

国内研究亦呈现出多元化的阐释路径,着眼点与国外研究既有共性也有拓展:朱振武(2022)认为,古尔纳利用隐喻修辞揭示出了非洲流散者的心灵创伤和殖民记忆[4];赵秀兰(2024)则从反写帝国、商旅叙事等角度关注到《天堂》对非洲历史的还原与重构[5]。然而,既有研究虽已触及“旅行”这一母题,却多将其视为承载历史内容与社会风貌的容器,较少从叙事学的角度,系统考察“旅行”如何作为一种结

构性力量，参与到流散主体的建构与解构之中。

在后殖民语境下，旅行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更是文化身份协商的隐喻场域。小说中优素福的旅途并非传统成长小说中线性的主体确立过程，而是一场不断被延宕、被碎片化的流散展演。这种独特的旅行叙事并未遵循经典现实主义的连贯逻辑，而是通过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局限性、多语言杂糅的话语策略、错综非线性的时空设置以及多重嵌套的文本结构，在形式层面精准捕捉了流散身份的混杂性与动态性。叙事形式上的破碎与流动，不仅生动描绘了流散个体在多重文化夹缝中的心理图景，更在深层结构上完成了对经典帝国主义探险文本的反写：旅行不再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与占有，而是流散者在异质空间中寻找归属却终不可得的永恒在途状态。

## 2. 空间位移与身份裂变：旅行叙事中的流散地缘诗学

总体而言，旅行是指人们出于某种特定目的，主动或被动地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遥远空间的位移行为。在《天堂》的宏观架构中，旅行叙事不仅占据了主要篇幅，更是构建小说意义系统的核心机制。古尔纳通过精细的商旅叙事艺术，描绘了一幅“人物形象众多，人物关系复杂，时空跨度度大的广阔商旅世界图景”[6]。然而，《天堂》中的旅行并非传统意义上出于休闲或审美目的的游历，而是一种被权力结构裹挟的空间实践。田俊武认为，从人类学意义上视之，旅行具有古老的仪式感与广阔的时空阉阉，它能够将不同地域的人物串缀在一起，表现人物在空间位移过程中所发生的身心变化[7]。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空间实践在殖民语境下往往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色彩。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中曾论及，“旅行文学、空想乌托邦、精神游记、科学报告日益扩大的影响使东方引起人们更广泛、更深入的关注”[8]。古尔纳的旅行叙事正是对这一传统的某种回应与反拨：他不再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眼光审视东方，而是通过非洲本土少年的视角，重新审视这片被各方势力角逐的土地。

在后殖民理论的视野下，物理空间的旅行与心理层面的流散存在着内在的同构关系。童明在《飞散》一文中指出“飞散”(Diaspora, 又译“流散”)不仅指涉移民与移位(Displacement)的状况，更包含着将“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联系起来的双重意识[9]。换言之，流散者即是处于“文化移位”状态的主体，而这种心理移位往往直接伴随着地理上的空间位移——旅行。对于主人公优素福而言，其旅程始于被父亲抵债后的强制性离家，这种被动性注定了他作为“本土流散原住民”的边缘地位：作为奴隶，他被迫在旅途中习得阿拉伯语、英语等宗主或殖民者的语言，却始终无法割舍自己的民族语言与记忆，这种语言与身份的撕裂使其“在自我身份认同方面存在纠结与挣扎”[10]。因此，旅行在《天堂》中不仅是地理坐标的移动，更是身份建构的一种隐喻：优素福在民族交流、文化交融与权力压迫的夹缝中穿行，其不仅身体在流放，内在亦于多重文化身份之间徘徊，陷入了归属难觅的困境。

这种流动的商旅空间，实际上构成了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谓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一个不同文化元素碰撞、交汇、协商与重构的场所[11]。在这个空间内，文化的本质主义定义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流动性与混杂性。古尔纳作为流散作家，在文本中鲜明地贯彻了这一流散立场，即“反对固化身份(Calcified Identities)，提倡混合身份(Hybrid Identities)的跨文化、跨民族特征”[9]。《天堂》正是立足于东非独特的区域历史，通过优素福与阿拉伯商人、印度技工、欧洲殖民者以及非洲原住民的跨民族互动，展现了一种动态的“当地性”(Localness)。这种当地性并非封闭的自我指涉，而是在跨文化、跨民族的比较与差异中得到显现。因此，旅行叙事在这里超越了简单的风景描摹，成为了展示流散身份如何在跨民族关联的动态网络中被不断解构与重组的关键场域。

## 3. 受限的凝视与反成长的旅途：儿童视角的叙事政治

《天堂》采用了第三人称受限视角，将叙事的感知中心锚定在少年主人公优素福身上。这种视角构

成了其“流散诗学”的一个核心美学特征：即通过建构一种“儿童视角”，对帝国探险文学中的全知视角与宏大殖民叙事进行审美层面的解构。正如申丹等指出，“感知往往能体现出特定的情感、立场和认知程度”[12]。小说利用优素福起初纯粹且有限的认知，建立了一种独特的观察距离。随着旅途的展开，这种天真的凝视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去蔽的工具：优素福对“优雅仁慈”的阿拉伯商人阿齐兹的印象，在海滨之旅中发生了断裂。当优素福发现阿齐兹“看上去非常严厉。不戴帽子时，他的脸显得更宽更胖，不成比例。当他静静地靠在那儿打盹时，那种引人注目的优雅风度不见了”[13]时，这种生理特征的近距离审视消解了奴隶主商人的神圣光环。而到了阿齐兹家之后，优素福更加真切感受到了前者和自己的距离感：阿齐兹进入带围墙的花园时，向正欲跟随的优素福比了个前所未见的手势，优素福从中感受到了斥责，明白了自己不能跟随。自此，优素福有了寄人篱下的无所适从，从第一次踏上离家旅途时就笼罩在心头的懦弱不安发展成了归属难觅、“天堂”难寻的痛苦挣扎。这种从虚幻的温情想象到冷峻的现实凝视的视角转换，不仅记录了个体的祛魅过程，更隐喻了流散主体在寄居生活中从盲目依附到直面冷酷现实的痛苦觉醒。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儿童视角不仅体现在认知局限上，更使优素福在旅行叙事中始终处于一种“结构性被动”的位置。不同于传统帝国探险小说中掌控一切、拥有理性分析能力的英雄主体，优素福是旅途的“跟随者”而非“推动者”：他被阿齐兹差遣，被哈米德管教，甚至被部落首领查图扣留。他在商队中充当类似于吉祥物的角色——优素福面容清秀，名字又与《古兰经》中的先知优素福相同——基本上没有人过分为难他。沿途的土著部落盘剥刁难商队时，也会因为优素福在场而把握分寸，不至于兵戎相见。这种主体性的匮乏恰恰是流散身份的核心特质——即流散者的命运往往被更大的社会历史力量所裹挟与摆布。这种有限视角的叙事策略具有普遍化的修辞功能：它通过个体的无力感，折射出整个东非殖民背景下流散群体在文化混杂与经济剥削夹缝中生存的集体遭遇。此外，有限视角还具有普遍化的意义。优素福的经历虽独特，却代表了殖民背景下许多离散群体的共同遭遇。这种视角避免过度聚焦个体的主观情感，通过外部情节和情境的描写，揭示了殖民体系对离散群体的普遍影响。优素福的经历得以成为整个东非殖民背景下文化混杂、经济剥削与身份危机的缩影，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

就旅行叙事的情节而言，《天堂》主要安排了三次旅行经历：第一次是优素福被卖给阿齐兹，与后者前往阿齐兹家所在的海滨小镇；第二次是优素福随商队出行，被安置在山乡小镇一年；第三次是阿齐兹商队与优素福汇合，一同前往内陆。这三次旅行是不连贯的、片段式的，中间穿插了优素福在阿齐兹家的商店和寄居商人哈米德家的日常，前后的时间跨度达七年之久。这种不连贯性正是流散生活碎片化特质的形式表征。其中，着墨最多的“内陆之旅”构成了对《黑暗之心》等经典欧洲帝国文本的有力反写。正如引言所述，Mustafa (2015)已揭示了小说在主题与互文网络层面对《黑暗之心》的复调式重写；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古尔纳这种“反写”的颠覆策略不仅停留在主题内容上，更深植于叙事视角的结构性倒置之中。在《黑暗之心》中，叙述者马洛持有的是全知、理性的帝国成年男性凝视，将非洲原住民物化为背景板，描写他们时仅关注“黑色的骨头全伸展开，一只肩膀靠在树上”[14]。古尔纳则将这一“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倒置，不依赖宏大叙事，而是利用优素福这一儿童不可靠且受限的视角，来“凝视”欧洲殖民者。小说对于欧洲殖民者的直接描写甚少，主要借旅行中的贩夫走卒之口将欧洲殖民者“妖魔化”“野兽化”，既突出欧洲殖民者的残酷暴虐，也反映非洲民众的迷信蒙昧。在优素福眼中，德国军官呈现出“畸形怪相”与“死尸般的面孔”，其“丑陋和残忍的样子”令人愕然[13]。这种视角的翻转不仅剥离了殖民者的文明伪装，更将他们还原为带来死亡与暴力的入侵者。同时，优素福的旅程虽然充满了奥德修斯式的艰险，身体日益茁壮，心智越发成熟，却并未通向英雄的凯旋，而是走向了彻底的幻灭：“他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他所了解的小世界是他唯一可以栖身的世界”[13]。

小说的结局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反成长”(Anti-Bildungsroman)的主题。优素福最终选择奔向德国殖

民军队，并非出于政治认同，而是在多重压迫下一种绝望的逃逸。这一开放式结局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白：优素福的命运处于未定之中，这种不确定性深刻呼应了流散身份的动态性与未完成性。“对流散族群来说，后殖民文化背景下的归‘家’之旅‘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15]。优素福那场未竟的旅途，打破了传统叙事对“大团圆”或“归宿”的期待，将流散者的生存图景定格为一种在历史暴力中永恒流动的在途状态。

#### 4. 众声喧哗与创伤修辞：旅途中的话语景观与心理地形

在《天堂》的旅行叙事中，古尔纳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语言接触地带”。小说打破了单一语言的霸权，将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与英语并置，形成了一种极具后殖民特征的“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这种策略并非简单的异域情调点缀，而是对东非沿海商贸网络中多元文化流动性的真实复刻。商队中的索马里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与斯瓦希里人构成了复杂的语言生态，这种混杂性深刻揭示了流散身份的本质。“翻译性”(Translational)和“跨民族性”(Transnational)有着紧密的关联，流散者通过在坚持自己家园文化差异的同时用另一种语言将其再创造，展现了“文化的可译性”[9]。优素福身处这一多重语言的交汇点，必须在母语与异质语言之间进行持续的协商，这种“在翻译中生存”的状态，恰恰是流散主体在文化夹缝中挣扎求存的真实写照。

古尔纳在用英文进行主体叙事时，刻意且频繁地保留了诸如 washenzi(野蛮人)、sayyid(老爷)等斯瓦希里语词汇。在句法层面上，这些异质性词汇通常不在段落内提供即时的英文翻译或注释，而是直接嵌入标准的英语句法结构中。这种语言运用策略在文本内部制造了一种“阅读阻滞感”。它迫使英语读者暂时悬置通用语言带来的阅读特权，亲身体验流散者在“语言接触地带”中所面临的陌生化与语义不确定性。

在人物话语的权力结构中，主人公优素福的“结构性沉默”构成了文本中最具症候性的表达。不同于口若悬河的锡克机械师卡拉辛加或满口斯瓦希里俚语的伙计哈利勒，优素福的内心活动和思想表达相对较少，一般只用简单句一笔带过，没有大段的内心独白，而是通过外部描写和对话展现他的处境。这种“失语”并非叙事的疏漏，而是边缘主体在主流话语体系中被压抑的隐喻。值得注意的是，优素福始终未能(或潜意识里拒绝)完全掌握主人阿齐兹的阿拉伯语，即便同属斯瓦西里族出身的仆人哈利勒告诉他学会使用阿拉伯语更能讨老爷欢心。这种语言上的隔膜构成了一种消极的文化抵抗：它象征着流散个体在被强制同化的过程中，对自我原初身份本能的坚守。此外，通过塑造哈利勒的市井粗俗、阿齐兹的宗教虔诚与卡拉辛加的世俗智慧，小说成功捕捉了流散生活处于多元文化混杂状态下的特质，实现了霍米·巴巴所提倡的“文化杂交性”。

如果说语言的混杂揭示了外部世界的流动性，那么反复出现的隐喻修辞则绘制了流散者内在的心理地形图。小说对《古兰经》中先知优素福“圆梦者”的原型进行了颠覆性改写：在《天堂》中，优素福的旅途被挥之不去的噩梦所缠绕。从“心怀惊奇与恐惧”出发，到最终觉得旅途变成“一个灰扑扑的、令人厌倦的模糊的噩梦”[13]，这种从神圣到世俗、从圆满到破碎的改写，将旅行叙事从物理位移引向了心理层面的创伤展演。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恶犬”这一核心意象的反复在场。在优素福的梦境与现实遭遇中，狗始终以凶恶、贪婪的面目出现。这一意象反转了传统殖民文本中将土著“动物化”的歧视性修辞，转而将充满剥削与暴力的殖民环境本身隐喻为一座危机四伏的丛林。不管走到哪里，“欧洲人都已经捷足先登，安置了士兵和官员”[13]，而那些在小说结尾处对优素福狂吠的野狗，正是这一无处不在的殖民暴力机器的具象化身。透过这些充满张力的修辞策略，古尔纳深刻揭示了流散主体在文化夹缝与权力压迫中遭受的精神挤压与存在主义危机。

## 5. 时空拼贴与叙事迷宫：流散历史的非线性重构

在《天堂》的文本构造中，古尔纳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连贯、匀质的线性时间轴，转而构建了一种错乱、折叠且非线性的“时空拼贴”。这种叙事时间与流散身份之间存在着严密的内在同构关系：流散本质上是一种由于强制性的空间位移而导致的个人历史与文化记忆的断裂。线性的时间观预设了主体发展的连续性，而这正是流散者所丧失的。小说中的时间呈现出一种“弥赛亚时间”的质感——即一种当下、过去与未来相互渗透的时刻[16]。优素福的旅途记忆并非按时间顺序铺陈，而是充满了闪回、预叙与记忆的黑洞。例如，当他在山乡小镇目睹哈密德教子时，时间瞬间折叠回童年遭遇乞丐穆罕穆德的时刻，两个截然不同的时空在“家破人亡”这一共同的创伤体验中重合。这种时空的互文与参照，暗含了多重时空下不同生存遭遇的参照，不同世界的互相诠释，最终指向的是人存在于时间中的永恒境遇[17]。对于流散主体而言，这种非线性的时间体验恰恰是其身份断裂的症候：他们无法掌控连贯的个人史，记忆片段与现实经历交错，只能在一种流动且未完成的时间状态中寻找自我的坐标。

空间维度上，小说中旅行叙事的空间涵盖东非的山乡集镇、村落、原住民部落、沿海贸易港口等，展现了殖民时期东非地区复杂的文化与经济网络。《天堂》共六章，其中前五章的标题分别为“带围墙的花园”“山乡小镇”“内陆之旅”“心心念念的树林”，皆与旅行和地点相关，编织出一个充满张力的地缘政治网络。这些空间不再是中立的地理背景，而是文化交融与权力博弈的“边缘空间”。优素福在这些远离传统家园中心的荒野、部落与贸易站中穿行，每一次空间的转换都伴随着身份认知的重构：初到海滨小镇，他懵懂地把阿齐兹当作和蔼的“叔叔”；到了内陆荒野，他被迫确认为“仆人”。这些边缘空间不仅象征了流散群体的边缘化地位，更构成了对他者身份进行规训与重塑的场所。

更为精妙的是，古尔纳在主线旅行叙事之外，通过嵌套式结构引入了大量由护卫、运夫、行商讲述的次级故事，构建了一座多声部的“叙事迷宫”。这种“叙事迷宫”并非单纯的修辞游戏，而是流散群体空间迷失与心理无根状态的结构映射：身处这一“迷宫”中的讲述者与聆听者都没有清晰的历史来路与确定的现实归宿。例如，蒙巴萨商人关于俄罗斯彼得堡与塔什干的奇幻讲述，虽然带有明显的虚构色彩，却在文本中开辟了另一重想象的地理维度。这种“故事套故事”的结构策略具有深刻的后殖民意涵：它使得那些在正式殖民档案中被抹去的“他者”——脚夫、流浪者、异教徒——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而在叙事层面上夺回了话语权[5]。尽管这些故事往往充满了悲惨与苦痛，古尔纳却通过这种众声喧哗，“并不把身处飞散生活状态中的人浪漫化，更不把这些人物描写成完美的化身”[9]，而是以一种冷静的笔触，坚持并深化了飞散视角，揭示了在宏大殖民历史缝隙中，个体记忆与民间讲述所蕴含的微观抵抗力量。

## 6. 结语

《天堂》以极具张力的旅行叙事，重绘了19世纪末东非殖民地区的流散图景，为后殖民文学中的身份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空间诗学范本。小说并未沿袭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逻辑，而是通过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局限性、片段化的情节拼贴、多声部的语言混杂以及错综嵌套的时空结构，在形式本体上外化了流散身份的碎片化与流动性。这种叙事策略不仅是对东非复杂社会历史的文学再现，更是一种深层的政治修辞：它通过形式上的破碎与不确定性，解构了殖民话语中关于“文明进步”与“理性秩序”的宏大幻象。

优素福的旅途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位移，演变为一场关于文化身份剥离与重构的心理剧。他在内陆与沿海、家园与异乡之间的不断迁徙，并未导向传统成长小说中主体性的确立，反而揭示了流散者在多重权力挤压下“无家可归”的生存困境[18]。这种“反成长”的叙事轨迹，完成了对经典帝国主义探险文本的有力反写：旅行不再是征服者的凯歌，而是边缘主体在文化夹缝中艰难求存的无声见证。

小说最终以优素福奔向殖民军队的开放式结局戛然而止，这一极具象征意味的留白打破了传统叙事对于“归宿”或“大团圆”的期待。它昭示了在后殖民的历史语境下，流散者的身份建构永远处于一种“正在进行时”的未完成状态。这种永恒的在途状态，既是殖民暴力造成的历史创伤，也是流散群体在动荡世界中确立自我的唯一方式。古尔纳正是通过这种未完成的旅行叙事，以儿童的凝视、杂语共生的接触地带以及非线性的时空结构，确立了其独特的流散诗学。这种诗学特征不仅在美学层面上成功颠覆了帝国探险文学的传统叙事范式，也真实确切地呈现了殖民语境下流散个体在文化夹缝中永恒且艰难的身份重构过程。

## 参考文献

- [1] Mustafa, F. (2015) Gurnah and Naipaul: Intersections of *Paradise* and *A Bend in the River*.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61**, 232-263. <https://doi.org/10.1215/0041462x-3112216>
- [2] Pujolràs-Noguer, E. (2023) Tracing Lines in the Trauma of Displacement: Slavery in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and *Afterlives*. *PMLA/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38**, 381-390. <https://doi.org/10.1632/s0030812923000275>
- [3] Götttsche, D. (2023) German Colonialism in East Africa and Its Aftermath in Abdulrazak Gurnah's Novels *Paradise* and *Afterlives* and in Contemporary German Literature. *German Life and Letters*, **76**, 269-284. <https://doi.org/10.1111/glal.12374>
- [4] 朱振武, 郑涛. 古尔纳《天堂》的隐喻叙事与殖民创伤[J]. 人文杂志, 2022(6): 67-75.
- [5] 赵秀兰. 重构历史: 古尔纳《天堂》中的非洲叙事[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4(1): 92-107.
- [6] 卢敏. 古尔纳《天堂》中的商旅叙事[J]. 外国文学研究, 2022, 44(2): 68-79.
- [7] 田俊武. 旅行写作[J]. 外国文学, 2021(4): 95-106.
- [8] (美)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151.
- [9] 童明. 飞散[J]. 外国文学, 2004(6): 52-59.
- [10] 朱振武, 袁俊卿. 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7): 135-158, 207.
- [11] Bhabha, H. (200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5-7, 53-56.
- [12] 申丹, 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94.
- [13]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天堂[M]. 刘国枝,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 26, 70, 155, 206, 213.
- [14] Conrad, J. (2005) *Heart of Darkness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17 p.
- [15] Cresswell, T. (2004)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37 p.
- [16] 韩伟, 任智峰. 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古尔纳小说的三个面向[J]. 外语教学, 2022, 43(3): 106-112.
- [17] 吴晓东, 倪文尖, 罗岗. 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9(1): 67-80.
- [18] 田俊武, 孙玉晴. “我是谁”——论《穿越》中的后殖民旅行叙事[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 30(3): 57-67, 112.